

中华

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1994-2014)

5版

2014年7月9日

[寄语]

编辑:韩晓东

中华读书报是

读书人的文化家

园和知识胜地

祝报纸越办越

好影响越来越

越大

贺中华读书报廿周年

生日浙江大学崔向东

感谢读书报开拓我们阅读
视野,提升我们阅读的质量!

洪子诚 2014年6月14日

天下之乐,
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
何如此乐。

录友人乐学诗,
为中华读书报创刊
二十周年贺。

林天石
二〇一四年
夏日

读书医思
读书致乐

贺中华读书报二十周年

冯天瑜 甲午夏月
林天石

食母

贺中华读书报二十周年

谢维和
二〇一四年七月

展示名家名作,
推出新人新作。

贺中华读书报
二十周年
杨耕

以真思引导学术前路,永不媚俗。

贺《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

张一兵

有立场但不大修改
有标准但不太严苛
有偏好但不太一致
有上进心但不太越俎

赠中华读书报
陈平原

好读书读
好杂志

贺中华读书报
创刊二十周年
汪国真

读书,这个我们以为平常的过程,
实际是人的灵魂和古今一切民族的
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袁鹰

敬致

本版题词:

陈平原 汪国真
冯天瑜 王明珂
葛剑雄 谢维和
洪子诚 严歌苓
雷颐 杨耕
刘心武 杨天石
罗卫东 张一兵
骆以军 (以姓名音序排列)

引领读书好风气

贺《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

外此

要读,还要读《中华读书报》。

雷頔

2014.6.25.

(上接第2版)

这个小谢廖沙是什么人呢?从时间、地点、人物关系诸方面考察,是毛岸英。

《李大钊同志略传》文中所示的,“现在正处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中”语句,李大钊纪念馆的学者据此考证认为文章写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但根据历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统一战线才从各方分散的零星努力和口号变成现实。略传一文,更可能写于1936年底或1937年初。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由康生带着,到达了莫斯科,到达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驻地——柳科斯大厦。

让我们还原一下岸英小兄弟当年赴苏的过程。

2.1936年,营救毛岸英兄弟赴苏的地下党员们,他们是谁?

1936年底或1937年初,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央特科)救助,毛岸英兄弟到达苏联。

营救毛岸英兄弟赴苏联的中共地下党员,现有记载的当事人共是六个。按时间顺序,为董健吾、冯雪峰、刘仲华、潘汉年、李云、康生。此外,与此事有关的还有国民党陆

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共为七个人。

七人中,国民党张学良将军声名最大。中共(当时的)党员中,从康生开始包括董、冯、潘、李,现在也已经都算知名人士。最不起眼、今天人们鲜有知道的、名字普通至极的是刘仲华,他的原名更一般,刘子华。

先说张学良将军。历史记载,张将军是岸英兄弟成行的经济资助者。一行九人漂洋过海,计划经巴黎到莫斯科,经济资助当然至关重要,史载张学良将军“当即拿出一张十万法郎支票”,一行人遂得以成行。从这点说,张将军的作用很重要。

关于康生。康生当时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是他前往巴黎,将毛岸英兄弟送往莫斯科。他起的作用,就是在欧洲接送毛氏兄弟。这有史料根据,各方没有异议。在他的此点作用外,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其他背景。毛小兄弟是在杨开慧烈士1930年在长沙牺牲后,1931年到达上海进入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1932年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下解散,园中孩子被疏散,小兄弟被疏散至“党员牧师”董健吾家。此时康生在上海,任职为中央组织

部部长,并且是特科保卫部门负责人。职责所系,无论是在大同幼稚园,还是在董家,康生都应该知晓毛小兄弟状况,并且应该去看望和关照过。这点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根据上述外围条件,推论应该成立。到巴黎接人的康生,对岸英兄弟来说,虽不算最熟悉的熟人长辈,应该也算见过。

从在上海营救角度说,张学良和康生不是当事人。

这两人以外,我们再说李云,李云是女性,当时只有21岁,是特科重要成员徐强的妻子,她也是特科成员。她记述自己是营救岸英兄弟当事人,前后共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次是2005年,时已高龄的她回忆,从1935年秋天开始,组织安排她寻找失去联系的岸英兄弟,风里雨里寻找了半年多,最后她没找到,是组织上找到了,但是组织上什么人找到的她不知道。按她的叙述,她的丈夫老徐应该知晓,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科严格的保密纪律,老徐到去世都没透露半个字。第二次是近年,她叙述,是她找到了岸英兄弟,以前是不便说。具体过程是,她在1936年春夏大约在五六月份间,在上海城隍庙的摊流流浪儿中找到了岸英兄弟,并立即汇报了从延安到达上海的冯雪峰同志。冯雪峰扮成

工人样子,到李述说的地点,找回了岸英兄弟。但李云没有述说岸英兄弟怎样赴苏的过程。李云后来由特科党组织安排,担任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

由李云的叙述,可知是她与冯雪峰找回了毛岸英兄弟。

我们再冯雪峰的相关记述回忆。冯雪峰是长征到达延安后,1936年四月被党中央派回上海。他自述党中央交给她多项任务,但在任务中没提到岸英兄弟。到上海后,关于岸英兄弟相关的记述是:

我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会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1934年

(19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是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他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另一处,他同第二个老婆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19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

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他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记得是他说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系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下转第6版)